

## 現代香港小說中的日本人形象—以『中國學生周報』和『香港文學』為例

吳學忠\* · 趙殷尙\*\*

- 次 例 -

1. 引言
2. 香港作家與兩份雜誌
3. 正·負兩面的日本人形象(50-60年代)
4. 日本人形象的轉變(70-80年代)
5. 日本人的正面形象(90年代)
6. 多樣化的日本人形象(97年-兩千年代)
7. 結語

---

\* 第一著者, 香港浸會大學 語文中心 高級講師, hcng@hkbu.edu.hk

\*\* 交信著者, 韓國培材大學校 周時經教養大學 副教授, d889108@hanmail.net

## [中國語要旨]

現代香港小說中的日本人形象—以『中國學生周報』和『香港文學』為例

不論在哪個年代，文學作品都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情況和意識形態。香港文學的歷史不算太長，卻發展出多采多姿的文學模式，伴隨著不同時代的變遷而演進。本論文探究香港小說中的日本人形象，有否因中日抗爭的關係變化而產生負面的評價。文章主要從『中國學生周報』和『香港文學』這兩份極具代表的文學雜誌入手，搜集香港逾半世紀曾出現日本人角色的小說故事進行分析論述，文章輔以小說實例探討近幾十年來日本人形象在小說中的轉變。大部份的香港小說創作者沒有因日本侵華戰爭和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保釣運動而製造一個負面的日本人形象，推動讀者反日的情緒；相反，從五十年代到現代，香港小說作品對日本角色描寫的轉變並不太明顯，都沒帶給讀者一個負面的日本人形象。

**關鍵詞：**香港、小說、日本、形象、『中國學生周報』、『香港文學』

## 1. 引言

香港文化非常多元，既有中西方文化的特質，也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其實，香港文學的發展歷史相對來說不算太長，王劍叢在『20世紀香港文學』一書中指出，香港的文學發展，大抵是從二十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發生後十年才開始的。<sup>1</sup>

五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學主要受到中國內地的文學影響，沒甚麼本土特色。由五十年代的政治性文學創作，到六十年代分出現代主義和寫實主義兩大流派；踏入七十年代，經濟起飛，通俗文學開始興起，與先前的現代、寫實主義創作並行發展構成一個多元化的局面。到了八十年代，香港文學變得更加多采多姿，產生一系列新的作品，也開始出現文學批評的研究，形成繁盛的景象。而到了九十年代，因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將終結，一批以回歸中國為主題的作品相繼湧現，成為香港文學一個大特色。回歸後的香港文學發展動力不減，不少小說的主題往往關注城市生活，批判現代社會中人性的墮落，也更加關注香港本土文化。可見現代香港文學的發展貫徹了多元化的特點。由於這些多元化的特點，香港雖是中國的一部分，往往顯示出異於中國的文化現象，進而絕不無批判地接受并模倣中國文學，尤其是香港人對日本人的認知。

中國內地學者盧德平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sup>2</sup>一文中研究了中國文人對日本的想法，他認為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人角色都是他們情感的投射，影響著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價值判斷，並把所有日本人典型化。他將現代文學作家分三類：二十年代留日作家、二十年代東北淪陷作家及三四十年代抗日時期作家。文中指出：留日作家對日本的描述比較具體、深刻；相反，非留日作家的作品對

---

1 王劍叢，『20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出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三章。

2 盧德平，「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文章刊載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11月第19卷第6期，頁103-108。

日本的描述則較為膚淺。而三、四十代的作品由於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大多以負面的角度描述日本人，而且角色都是入侵中國的日本軍人，在這種文學作品的「陶薰」之下，中國人漸漸把侵華日軍殘暴性格與日本人劃上了等號。盧德平於文章中集中討論二十年代留日作家營造的日本形象。他們形容日本風光如畫，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大都會。可惜，這個大都會一切以金錢掛帥，階級觀念極強，貧窮的中國留學生受盡歧視，與日本的低下層勞動者經歷著一樣的苦況，被社會摒棄。角色描述方面，留日作家對日本女子的評價大多屬正面，她們都是純溫柔、擁有雪白肌膚的漂亮女孩；但日本男性卻是醜惡、粗魯的，這個分歧，可能是由於日本女性和留日學生一樣都是受日本男性欺壓的一群，故作家對日本女性充滿同情，另一方面又醜化日本男性。這些描述很容易在中國讀者的腦海之中留下烙印，建立了一個典型的日本人形象。

盧德平的研究也可套用於香港小說研究之中。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在日本侵華時期也曾受到日本炮火三年零八個月的洗禮，很多香港人流離失所，親眼目睹了日本軍隊的侵害。因此，長期以來，香港人對日本人的評價大部分都是較負面的。<sup>3</sup>但是嚴格來說，這些看法只不過是膚淺的認知，事實上并非如此。為什麼會有這種認知？其原因在於香港小說批評卻缺乏這方面的討論。

基於此，本論文旨在研究近幾十年香港小說作品中有關日本人角色的形象演變，有否因中日抗爭的關係變化而產生正·負面的評價。文章主要從『中國學生週報』和『香港文學』這兩份極具代表的文學雜誌入手，搜集香港逾半世紀曾出現日本人角色的小說故事進行分析論述，文章輔以小說實例探討近幾十年來日本人形象在小說中的轉變。

---

3 例如香港人稱呼日本人為「蘿蔔頭」：據說日本侵華時，日軍都帶著一頂以羊毛製成的綠色軍帽。這種軍帽是高身及呈橢圓形，戴在頭上時成卵形，遠看像蘿蔔，因此中國人便稱日本人為「蘿蔔頭」。

## 2. 香港作家與兩份雜誌

本論文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於由香港作家所出版的小說，但關於香港作家的定義，不同學者卻有不同的見解。香港文學界一直以來也有討論何謂「香港作家」，但學者們都認同很難為此下一個界說。因為五、六十年代和之前的香港作家，大部分是從國內遷移來香港的，儘管文化背景不同，但他們的作品都在香港發表，而且能夠深入描繪香港的社會情況，如硬要說「香港作家」只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文人，那似乎抹殺了南來作者對香港文學所作出的貢獻。因此，對於甚麼是「香港作家」所創作的「香港文學」這一問題，借用鄭樹森的說法，香港文學可包涵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前者是指“出生或成長於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寫作、發表和結集的作品”；後者則包括“過港的、南來暫住又離港的、僅在台灣發展的、移民外國的”，而兩者之間，“隨著時間的流逝，有時不免又得重新界定。”<sup>4</sup>

而馮偉才在『香港短篇小說選』的序之中，說了不同的說法：

“本地寫作的香港作家為準，無論他來自大陸、台灣或外國，只要已在香港定居(即香港法例下的香港居民)，其所發表的小說，均被視為香港文學作品”<sup>5</sup>。

他對香港作家的定義是個較寬鬆的觀點：作者只要曾在香港居住過一段時間，而且作品是在香港發表的，都可視為香港作家。本文則採用馮先生的看法選取了三十九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在香港發表，而當中都有日本人角色出現的小說作品進行分析。(見表一)這些小說作品，除了四篇是以獨立發行本出

---

4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xix。

5 馮偉才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86-198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序言。

版外，其餘諸篇均取自『中國學生周報』及『香港文學』兩本期刊。這兩份雜誌分別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後香港文壇極具有代表的刊物。

(表一)

書名/ 篇名	作者	寫作年代	發表/ 出版日期	發表書刊或出版社
小鬍子	郭晉秀	五十年代	1955年8月26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162期
雲麗嬌	洪道	五十年代	1955年11月25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175期
櫻子姑娘	徐速	五十年代	1958年5月16日、23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304、305期
小雲雀	徐速	五十年代	1958年6月17日、24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308、309期
曙光在望	徐速	五十年代	1958年7月18日、25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313、314期
荊棘花	黃崖	五十年代	1959年4月14日、24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352、353期
煉	艾思明	五十年代	1959年7月3日、10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363、364期
白蘭花	舒巷城	六十年代	1962年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媛媛	徐速	六十年代	1965年	當代文藝
幽玄之美與愛八一春日若宮的紫	云上人	七十年代	1972年10月6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1055期
幽玄之美與愛外篇一水仙的故事	云上人	七十年代	1973年12月5日	中國學生周報第1113期
追情	陳浩泉	八十年代	1982年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停車暫借問	鍾曉陽	八十年代	1983年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雪夜	郭恩慈	八十年代	1985年6月5日	香港文學第6期
手	劉同續	八十年代	1986年3月5日	香港文學第15期
安娜的最後安息—西伯利亞列車之一	黃傲雲	八十年代	1989年3月5日	香港文學第51期
守川的誤點—餐—西伯利亞列車之二	黃傲雲	八十年代	1989年12月5日	香港文學第60期
敬子的遲來春天—西伯利亞列車之三	黃傲雲	九十年代	1990年1月5日	香港文學第61期
跨島賞紅楓	慕容羽軍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5日	香港文學第63期
教授之死	周惠娟	九十年代	1992年7月5日	香港文學第91期
胡椒樹	黃文湘	九十年代	1995年10月	香港文學第130期
亡魂	甘豐穗	九十年代	1995年12月1日	香港文學第132期
萬年靈芝	方禮年	千禧年代	2001年5月	香港文學第197期
「屋與球場	潘國靈	千禧年代	2004年1月	香港文學第229期
幸福的蕎麥麪	也斯	千禧年代	2004年2月	香港文學第230期
蒲草燈	遲子建	千禧年代	2004年3月	香港文學第231期
紅燒鯉魚	嚴力	千禧年代	2004年9月	香港文學第237期
異域	關麗珊	千禧年代	2004年10月	香港文學第238期
博士碩士不是	龍昇	千禧年代	2005年8月	香港文學第248期

時光·聯想	董「章	千禧年代	2005年10月	香港文學第250期
三月麒麟座	盧因	千禧年代	2005年11月	香港文學第251期
東京的天空	關麗珊	千禧年代	2006年4月	香港文學第256期
LP流浪記	張錦忠	千禧年代	2006年5月	香港文學第257期
風箏	潘雨桐	千禧年代	2006年7月	香港文學第259期
無窮無盡的節日	陳寶珍	千禧年代	2008年1月	香港文學第277期
死寂的南根	崑南	千禧年代	2009年1月	香港文學第289期
廚房一角	麥浪	千禧年代	2009年11月	香港文學第299期
微型小說四題	司馬攻	千禧年代	2011年6月	香港文學第318期
閱讀遠藤周作的女孩	勞國安	千禧年代	2011年9月	香港文學第321期

『中國學生周報』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創刊，一九七四年七月停刊，其創辦目的是延續三、四十年代的文學風氣，宣揚中國文化及為青少年提供一本健康讀物。『中國學生周報』的內容不僅包括學術資訊和文學活動的報道，還設立了投稿園地鼓勵讀者參與文學創作，是五十至七十年代著名的學生刊物。

至於『香港文學』則創刊於一九八五年一月，首任總編輯是劉以鬯先生。他解釋創辦『香港文學』是希望“提高香港文學的水準”及“將各地華文文學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sup>6</sup>因此，『香港文學』刊登很多海外華人作家的文章，但正如劉以鬯所說，那些作者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為繁榮香港文學作出了貢獻。<sup>7</sup>直至現在，『香港文學』仍然肩負起推動華文文學的責任，受到文學愛好者的歡迎。

### 3. 正·負兩面的日本人形象(50-60年代)

五、六十年代正值二次大戰結束，香港剛從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一般大眾都不能忘記日本侵華的事實，在香港淪陷期間，人民都受到日軍迫害，導致親人失散，流離失所。因此，香港社會普遍產生一種排斥日本的心理。小說作品具有反映社會現象的功用，這裏討論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作品怎樣描寫日本的角色。

就角色的外表來說，我們發現五、六十年代的小說都傾向把日本人典型化。故

事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是日本軍人，都很威嚴，而且眼睛小及長有鬍子。如「荊棘花」中的祐成大尉是‘緊繃臉孔’<sup>8</sup>，‘練’的谷崎大尉則“嘴唇上有著一叢鬍子，一雙神秘莫測的眼睛，滿是橫肉的臉孔。”<sup>9</sup>另外，「櫻子姑娘」裏櫻子的爸爸犬養隊長被描寫為：

“穿著寬大的和服，坦露著毛茸茸的胸腺，有『東洋鬍子』……很像是日本畫報上『柔道』的選手。”<sup>10</sup>

而『白蘭花』的山本次郎有‘細小的眼睛、圓鼻子’<sup>11</sup>。至於女主角，則是外表美麗的。例如「云麗嬌」的主人公云麗嬌，她是一位演員，長得“漂亮，很多達官貴人為她的聲色傾倒”<sup>12</sup>；「櫻子姑娘」的犬養櫻子是嬌美的：

“長得小巧玲瓏，很像日本畫報上的廣告女郎，很美，有一種我們女同學所沒有的娟秀和嬌柔……頭髮披在肩上，拖著木屐，小圓臉凍得紅紅的，像搽了鮮艷的胭脂，美麗極了。”<sup>13</sup>

而『媛媛』的佐藤貞子外貌也很可愛：

---

8 黃崖，「棘花」，『中國學生周報』第352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9年4月17日)，頁8。

9 艾思明，「鍊」，『中國學生周報』第363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9年7月3日)，頁12。

10 徐速，「小雲雀」，『中國學生周報』第308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8年6月17日)，頁8

11 舒巷城，『白蘭花』，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371、377。

12 洪道，「雲麗嬌」，『中國學生周報』第175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5年11月25日)，頁5。

13 徐速，「櫻子姑娘」，『中國學生周報』第304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8年5月16日)，頁8。

“穿鮮艷和服，梳假髻，面上塗上一層厚厚的白粉，像泥娃娃。”<sup>14</sup>

受到仇恨日本的心理影響，在描繪日本人的性格和行爲時，大多帶有負面的色彩。「小鬍子」的日文課顧問在學校裏當暗探，調查中國人的活動，但他卻是‘不耐煩’、‘壓根兒不會點什麼’，而且是‘教書效率差’<sup>15</sup>的人。另外，「荊棘花」的谷川大佐和祐成大尉，都是狡猜、陰險的人，不但對中國抗日份子丁毅嚴刑逼供，谷川大尉更要脅女主人公陳靜音下嫁給他以換取釋放丁毅。‘練’的日本軍官谷崎大佐與谷川大尉一樣，爲這主人公李國輝幫日本軍做事，抓了李的妻子以作威脅。『媛媛』的鈴木大佐，被形容爲一個‘老奸巨猾、殺人不眨眼的惡魔’，<sup>16</sup>他污辱了部下佐藤武雄的妹妹佐藤貞子，更以權謀私，爲防佐藤武雄替貞子報仇而把他調往戰場。而『白蘭花』中的山本次郎雖然不是軍官，但他偽裝成中國人替日本做情報工作，舉報香港的抗日份子，出賣自己的老師。他更認爲自己的工作是在維護和平，並爲自己的‘大日本國民’的身份感到驕傲。這些日本角色的描寫，都可反映出文學作品中的反日情緒。

不過，這一時期香港小說作品中對日本人的形容又不是一面倒負面的，一些作品也塑造了正面的日本人角色，如「云麗嬌」的同名女主角，她是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員，更是一位通曉中國語、英語、日本語和俄語的日本女間諜，使日本在日俄戰事中取得勝利。『媛媛』中的佐藤武雄和妹妹佐藤貞子也是一個好例子。佐藤武雄性格善良溫和，並憎恨日本軍的所作所爲；他反對用戰爭解決問題，希望透過婚姻消除中日之間的仇恨。而且他很愛護妹妹，當知道貞子被鈴木奸姦污後，爲了復仇而不理後果毒死鈴木，最後自殺身亡。佐藤貞子則是一個溫順的女孩，她“愛日本，也愛中國”<sup>17</sup>，期望中日和平友好。貞子也是一個勇敢的人。她爲救被困在

14 徐速，『媛媛』，香港，當代文藝，1994年，頁155。

15 郭晉秀，「小鬍子」，『中國學生周報』第162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5年8月26日），頁9。

16 徐速，『媛媛』，香港，當代文藝，1994年，頁274, 350。

17 徐速，『媛媛』，香港，當代文藝，1994年，頁89。

獄中的哥哥而獻身於鈴木大佐，最後珠胎暗結，被迫墮胎而弄至瘋瘋癲癲，結局可憐。與貞子同樣勇敢的是「樓子姑娘」裏的犬養樓子。她因是日本人而給同學取笑侮辱，但她沒有退縮，反而據理力爭，站起來為自己辯護；她也愛和平，對同學說他們是朋友，“應該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大家像兄弟姊妹一樣”。<sup>18</sup>最後，樓子更以德報怨，協助並要求父親營救被日本憲兵拘捕的同學，消除同學對她的誤解。

從上述例子可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說對日本人的描寫並不是絕對一面倒的負面。一般日本軍人都被形容為奸詐、狡猾和殘暴的，但這可能只是反映日本侵華的事實；絕大部分日本女性在香港文學作品中都是美麗、溫柔而勇敢的，她們在讀者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

#### 4. 日本人形象的轉變(70-80年代)

在六十年代後期，受到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影響，香港人開始關注本土文化、民族身份認同等問題。一九七一年，日本政府公開發表釣魚台是其領土的言論在華人地區引起了‘保衛釣魚台’運動，香港市民紛紛舉行示威遊行，宣洩對日本的不滿，聲稱釣魚台是中國的一部分。<sup>19</sup>這一時期香港人的反日的情緒又再次推向高峰。

不過，這股反日情緒似乎沒有在小說作品中反映出來，大部分七十年代創作的小說大多沒有包含日本人角色，除了在一九七二和七三年於『中國學生周報』

18 徐速，「樓子姑娘」，『中國學生周報』第304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8年5月16日)，頁8。

19 古遠清，「七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學生周報』」，『香港文學』第145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7年1月1日)，頁10。

發表的兩篇相關的故事：「幽玄之美與愛八一春日若宮的紫」與「幽玄之美與愛外篇—水仙的故事」，它們都是描寫主人公‘我’到日本時的一些經歷。「春日若宮的紫」描寫‘我’在日本奈良公園認識了三笠藤子，她是公園神社裏的職員。藤子有：

“一張笑盈盈的圓臉……眼睛並不大，可是很靈活；嘴巴闊一些……與兩頰的淺淺梨渦相襯……一把直而長的黑髮束在背後。穿的是白衣紅裳的巫女裝……顯得一派聖潔……而手臂與小腿，都很圓潤，卻並不顯得胖，只是身材略矮了些。”<sup>20</sup>

藤子非常友善，帶‘我’周圍遊覽，所以‘我’對她產生好感。但原來藤子已被父母安排了婚事，所以這段感情無疾而終。至於「水仙的故事」就講述‘我’遇到當藝妓的日本女子—水仙。水仙的樣貌漂亮，是一個‘艷裝藝妓’，而且能歌善舞。但水仙的遭遇悲慘，她當藝妓是爲了賺錢醫治丈夫的疾病，可惜她的丈夫抵受不了痛苦，在水仙其中一個表演的晚上自殺了。

由以上兩則故事可見，作者對日本女性的描寫和五、六十年代的很相似。她們都是美麗而嬌小玲瓏的，與一般大眾對日本女性的印象很吻合。另外，她們雖然遭遇可憐，但都能勇敢面對，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

八十年代基本上延續七十年代的發展，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但同時社會的意識形態改變了不少，西方思想文化令社會開放，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熱潮已冷卻下來，仇恨日本的心理沒有以往般強烈，香港大多數市民因日本侵華、侵略香港而產生的仇日心態漸漸消退，這一時期香港小說作品中的日本角色不再有正面、負面的分野了。然而，小說作品對日本人外表的描繪在八十年代

---

20 云上人，「幽玄之美與愛八一春日若宮的紫」，『中國學生周報』第1035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72年10月6日)，頁6-7。

仍保存傳統的典型模式。比如在『停車暫借問』一書中，主人公趙寧靜形容日本軍人：

“圓咕嚕咚又一個，圓咕嚕咚又一個，矮爬爬扁塌塌的，走道兒臃得臃的，眼睛小不丁點兒的……”<sup>21</sup>

『追情』中的內藤津子則是‘美得像一株晶璧透的白荷’，<sup>22</sup> 擁有一圓的眼睛和甜美的笑容，像一個洋娃娃，“穿起了傳統的和服，十足是一個‘日本妹’了”。<sup>23</sup> 而津子的爸爸內藤佐夫在照片中的模樣是：

“瘦瘦削削的，樣子頗斯文，但臉上卻蓄了點鬍子。兩道眉毛粗粗的……”<sup>24</sup>

除此之外，在刊登於『香港文學』的故事「手」之中，主角小田年是一位：“六、七十歲，矮矮胖胖，總是戴一頂大闊邊的舊草帽，穿一套淡灰色的香港衫。”<sup>25</sup> 至於黃傲雲的「西伯利亞列車」三部曲，日俄混血兒安娜沒有日本人的特徵，反而“有比日本人高得多的鼻子，高瘦的身材，修長的小腿”<sup>26</sup>；相反，守川義江教授的外表則是：“有典型上一代日本人的身材、身型，經常穿一套淺啡方格西裝，好像要托他的方形臉孔一樣，頭髮灰白。頭戴灰帽，大概是想增加高度。”<sup>27</sup> 由此可見，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說對日本人外表的描繪仍然保存傳統的典型模式。

21 鍾曉陽，『停車暫借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頁15。

22 陳浩泉，『追情』，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頁38。

23 陳浩泉，『追情』，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頁63。

24 陳浩泉，『追情』，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頁9。

25 劉同績，「手」，『香港文學』第15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6年3月5日)，頁9

26 黃傲雲，「安娜的最後安息—西伯利亞列車之一」，『香港文學』第51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9年3月5日)，頁21。

27 黃傲雲，「守川的誤點晚餐—西伯利亞列車之二」，『香港文學』第60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9年12月5日)，頁44。

而在角色性格行方面，已沒有大奸大惡的軍官出現，反而日本主角都是一些現代、貼近現實生活的人物，性格是人性化和有血有肉的，讓讀者較易產生共鳴。

『停車暫借問』的日本人千重與中國女孩趙寧靜相愛，但當日本戰敗後，他們被迫分開，千重雖然沒有做過甚麼壞事，但令趙寧靜改變了對日本人的看法，不再憎恨日本。而『追情』的內藤佐夫和津子更加是大好人，他們好客熱情，殷勤地招待由香港到日本讀書的租客林正宇，津子還帶林正宇到日本遊玩，兩人發展出戀情。內藤佐夫不反對女兒和中國人來往，因他曾經到過中國，深刻認識中國文化，津子的媽媽更是一位中國人，可惜因戰爭而失散。因此，內藤父女對中國人很友善，他們對日本的暴行感到內疚，但認為戰爭已過去了，中日不應再為此而互相仇恨，“和平實在是最美好的財富”。<sup>28</sup>

「手」的主人公小田年也為自己協助日軍侵華而感到非常怯疚，他在二次大戰時期幫助日本憲兵做翻譯的工作，傷害中國百姓。戰後他逃到巴西當洗衣工人，最後為補償自己的罪行而選擇自殺。

另外，在「雪夜」這個短篇小說中，兩個由日本到法國的好朋友悠美子和菊子最後變得互相猜忌，悠美子不喜歡日本的傳統，竭力裝扮成地道法國人的模樣，這樣令菊子很妒忌她。雖然兩位女主角都帶有負面的性格。但這全是人性的表現，不是因為她們是日本人的身份，故事反而道出了日本人在外國生活的困難與無奈。「西伯利亞列車」三部曲裏共有三位日本角色，其中安娜擁有一半日本血統，並且在日本生活。不幸地，她患上血癌，但無論有多辛苦、多困難，她都希望能回到另一個故鄉——俄羅斯看看，可見她是一位有勇氣、懷念故鄉的女子。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是守川義江教授，他在一九四三年，即他十三歲那年被徵召入軍隊，殺害了無數中國百姓，但他為自己的暴行感到羞恥：

---

<sup>28</sup> 陳浩泉，『追情』，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頁221。

“戰敗回到日本後，守川經常哭泣，爲往日的自己、爲往日的日本哭泣。到進了大學後，守川開始對中國人更加同情。”<sup>29</sup>

守川也是一位長情的人，他和中國女子伊梅相戀，可惜伊梅最後離開了他。他忘不了伊梅，所以選擇自殺，永遠留戀過去。而守川敬子是守川義江和伊梅所生的女兒，她十九歲便被送到英國念書，在異地的遭遇悲慘。敬子完成學業後找不到工作，又被情人拋棄，結果出賣肉體賺錢維持生活。但她沒有放棄，並決定和一直在身邊支持自己的中國人呀洪到香港展開新生活，反映出她對生命態度是積極正面的。

回看七、八十年代的小說作品，日本角色的描寫已不會令讀者產生負面的印象，外表容貌帶有典型色彩，但程度上已沒有從前的那麼深厚了。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研究的作品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日本人都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感到內疚，他們爲此做了不同程度的補償，有些故事更宣揚中日和平友好的信息，可見作者沒有因中日戰爭和保釣事件而抒發反日情緒，不希望他們的文學創作加深社會對日本人的仇視。

## 5. 日本人的正面形象(90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已進入一個資訊科技、商品消費的世紀，每分鐘都在接收世界各地的文化訊息，市民大眾，尤其是年輕一輩，對國家民族的議題已不甚關注。至於日本文化，人們不但沒有抗拒，反而樂於接受，青少年更視之為一種潮流，身穿日本品牌的衣服、看日本劇集和電影、聽日本音樂等等，日本文化已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依照這樣理解，八十年代後的香港小說應該找不到醜化日本人

<sup>29</sup> 黃傲雲，「守川的誤點晚餐－西伯利亞列車之二」，《香港文學》第60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9年12月5日)，頁50。

的描寫。不過，保釣運動在九十年代中又再次被發起，日本重申擁有釣魚台的主權，這引起中港台民眾的不滿，於是政治團體紛紛到釣魚台，以捍衛中國的領土。不幸地，香港的其中一位保釣份子陳毓祥在前往釣魚台的途中遇溺身亡，這使華人保釣反日的情緒更加高漲。

但對於保釣反日的浪潮，香港文學界並沒有推波助瀾，因日本角色在九十年代小說裏的形象，大致和七、八十年代的相同。日本人的外形，特別是男性，仍是那些小眼睛、小鼻子的模樣。像「亡魂」的兩位主人公：

“配中將領章的年約五十許，面目清矍，鼻架眼鏡，他是日本華南派遣軍統帥田中久一中將；另一個矮胖小眼睛的是特務機關長澤榮作。”<sup>30</sup>

而女性則是一貫的漂亮，如「教授之死」的川下夫人：

“很美，年輕時，她應該是一個大美人，頭頂繞上一圈髮髻，瘦瘦的身材，流露一臉閑雅，嘴巴略大，兩片微厚的唇，很有個性。”<sup>31</sup>

還有「胡椒樹」的瑪嘉麗·宮本：

“粗長的眉毛，很深的雙眼皮，一雙很亮很黑的眼珠，長而密的睫毛，嬌小玲瓏而鮮潤的櫻唇，以及潔白整齊而且纖巧的牙齒，使方志遠覺得有不可形容的美麗”<sup>32</sup>。

---

30 甘豐，「亡魂」，『香港文學』第132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5年12月1日)，頁17。

31 周惠娟，「教授之死」，『香港文學』第91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2年7月5日)，頁34-35。

32 黃文湘，「胡椒樹」，『香港文學』第130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5年10月1日)，頁85。

而角色性格行為方面，這一時期的小說作品大都採用較正面的描寫。「跨島賞紅楓」中的菊子很友善及樂於助人，她當主人公的導遊，帶主人公遊覽日本的北海道。至於「亡魂」的日本軍官田中久一和長澤榮作都為自己侵華的暴行感到後悔，並責備日本的軍國主義。另外，「教授之死」的川下夫人很受主角小周的尊敬，她對小周的一番話和她丈夫的自殺令小周反思自己生命的意義。

「胡椒樹」中的瑪嘉麗·宮本是一個性格開朗、思想成熟和勤奮工作的女孩，並且教曉主角方志遠很多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而在「萬年靈芝」裏的日本人角色卻被形容成“吵吵鬧鬧的，討厭極了……總在我們的地方囂囂張張”<sup>33</sup>的較負面形象；不過，這種例子在同時期香港小說中寥寥无几，少之又少。

雖然香港社會在九十年代中期曾掀起保釣反日熱潮，但從以上所討論的小說作品之中，可發現當中對日本人的描繪與七、八十年代的很相似，評價都較正面的。當然，並非每一個日本角色都是大好人，但作者們都沒有刻意抹黑他們是大奸大惡的人。

## 6. 多樣化的日本人形象(97年-兩千年代)

香港回歸中國(1997年)後，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在自由的氛圍下，隨著新生代作家的成長，他們再次引領香港文學持續發展。這些新生代作家大部分都成長於七、八十年代，受到日本流行文化的衝擊，或多或少都在作品中呈現出當代香港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例如潘國靈「鐵屋與球場」：

“這天，他又一如往常地在班房走廊上，隔著鐵絲網格子看學生踢皮球。學校有兩個操場，一個已被男學生霸佔了，另一較小的，則有十來個女學生圍著圓圈打排球

33 方禮年，「萬年靈芝」，《香港文學》第197期(2001年5月)，頁23。

。他想起自己年代的日本電視節目『排球女將』。”<sup>34</sup>

也從董啟章『時光·聯想』中也可看到香港青年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情況：

“列車來到大圍站的時候，耳機內正播放著一青窈的CD，手上捧著大江健三郎的『憂容童子』中譯本。”<sup>35</sup>

而不少香港人在工餘時間都自發學習日語，例如黎翠華『黑雨』中的故事主角淑貞就利用工餘時間進修日語：“她從沒有約會，工餘時間安排了不同的進修課程，打字、簿記、會計、英語、日語……有各種各樣的文憑。”<sup>36</sup>勞國安『閱讀遠藤周作的女孩』作品煞有介事地介紹了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曾獲多項文獎，更獲日本文化勳章，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我從未讀過遠藤周作的書，上網看過他的生平和作品介紹後，覺得他的小說很嚴肅沉重，非一般娛樂作品，猜想閱讀遠藤周作的女孩的文化水平和修養一定很高。”<sup>37</sup>

甚至不少香港人對日本是充滿著好感的，例如也斯『幸福的蕎麥麪』：

“於是在去大阪開會的時候給愛麗絲掛了電話。她真好，在我餘下的一天，帶我看了我之前作為遊客沒有看到的京都。在賀茂川她住的那區散步，看著河裏的鴨子，天上的雲和飛鳥，我感到許久沒有這樣的開心了。我們在附近閒逛，走

---

34 『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五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13。

35 董啟章，『時光·聯想』，『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九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10。

36 黎翠華，『黑雨』，『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十三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頁77。

37 勞國安，『閱讀遠藤周作的女孩』，『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十四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頁238。

進一戶賣舊物的人家，原來是名宅，主人又給我們泡了茶，看她們收藏的古老和服……在京漬物老店，嚐著千枚漬、菊葉漬、壬生菜漬，都盛在優雅的碟子上，配一碗入荷新米飯，看著這些鮮白、嫩黃、翠青的顏色，吃著清淡可口的美食，我想：難怪京都變成愛麗絲流連忘返的樂土了……愛麗絲真像個京都人那樣禮貌周周。”<sup>38</sup>

一些作品例如麥浪『廚房一角』也指出日本男人都是愛不得的，故事主角蘇珊是這樣評論剛剛分手的日本男朋友：“說來也真荒謬，最初我是因為小時候看香港電影，看成龍而對亞洲文化產生好奇心，後來竟然跑去日本學日語，而不是學中文。又陰錯陽差，竟然交了日本男朋友，又愛得死去活來……日本男人都是愛不得的。”<sup>39</sup>有些作家在作品中也提及日本人對華人的觀感，關麗珊『東京的天空』就指出很少日本人喜歡中國人，更不願面對侵華歷史：

“近年有許多內地人來到日本，有些人偷竊、賣淫、打劫，以至糾結幫會破社會秩序，令日本人不喜歡中國人，中國人互相仇恨的案件更令日本人瞧不起中國人……當然，中國人也不見得喜歡日本人，首相每年去拜靖國神社，每年惹來中韓的指摘，但右翼依然強勢，從來不願面對二次大戰所犯的罪行。不過，一般日本人不懂政治，年輕一輩更不相信日本會屠殺別國的人，只知外人來到日本令治安差了，不喜歡中國人。”<sup>40</sup>

陳寶珍『無窮無盡的節日』中更重提日本侵略香港的歷史：“香港三年零八個

38 也斯，「幸福的蕎麥麪」，『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五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87。

39 麥浪，『廚房一角』，『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十三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頁315。

40 關麗珊，『東京的天空』，『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九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133-134。

月的黑暗歲月始於1941年聖誕節。”<sup>41</sup> 盧因『三月麒麟座』更詳細描述了日本侵略香港時期香港社會情況：“1942年4、5月間，日軍佔領香港將近半載，港地衛生設施與醫藥奇缺，時疫橫行傳播。慘遭戰禍蹂躪，居民因而營養不良，感染惡疾常不出三天死去，霍亂是其一。病人坐以待斃，死後棄屍冷巷。”<sup>42</sup> 董啟章『時光·聯想』中還提及日本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刻意迴避侵華歷史：

“我們都想知道小津對戰爭的態度。不久前在一片抗議日本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的浪潮中，在報上讀到梁文道的一篇文章，他主張應該把矛頭指向「反罪」而不是「反日」。文章裏面引述了小津行軍時所寫的一段關於中國山河之美的描寫，梁也就發出了相同的疑問：孜孜探索人倫關係，處處流露人文關懷的電影大師，究竟是怎樣看待自己國家的侵略行爲，和自己曾經親身參與其中的這回事呢？可惜他發現，小津對此事緘口不語。”<sup>43</sup>

這一時期的香港作家對日本社會情況也有一定的理解，例如關麗珊『東京的天空』就指出日本普通百姓變窮了的社會現實：“日本近年的生活指數不斷下降，從來是草根階層飯堂的生井店，現在的食品更見便宜，一碗小牛井飯加味噌湯賣二百九十日圓。以前只有基層男性吃這種粗食，現在多了女客，白領食客也增加，反映日本人普遍窮了。”<sup>44</sup>

在日本人物形象方面，這一時期香港小說作品中對日本人的形象既有正面的

---

41 陳寶珍，『無窮無盡的節日』，『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十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144。

42 盧因，『三月麒麟座』，『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九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47。

43 董啟章，『時光·聯想』，『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九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15。

44 關麗珊，『東京的天空』，『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九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頁120。

描述，也有負面的寫照。例如嚴力的「紅燒鯉魚」就指出日本的生活是獨有的，“日本的事物從飛機降落的一瞬間開始進行了記錄，直到五年之後我來到美國才發現言剛剛過去的五年給了我很多的回憶，對比紐約的生活它們有許多共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是日本獨有的。”<sup>45</sup>在這部作品中，大多數日本人是守法秉公辦事的：“日本人如果看見我抓這些供觀賞的魚，第一會把我抓起來，第二會把我從這個國家趕走。”<sup>46</sup>然而，作品中也提到甚麼都敢幹的日本小子：“他說這個日本朋友也是個甚都敢幹的小子，沒問題的。”<sup>47</sup>日本學生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強調世界和平，也斯「幸福的蕎麥麪」是這樣描述日本人遊行示威情況和民主主義文化：

“我早幾天也在灑谷在大街上見過，抬了布殊的漫畫像、有棺材，隊伍裏有和尚，有扮成戰士的持槍者，舉起反對跟隨美國派兵的牌子，他們還改編了聖誕歌，一邊走一邊敲鼓，抗議國家的軍事新政策。”<sup>48</sup>

除此之外，不少作品也有描寫做學問嚴謹的日本人教授<sup>49</sup>、知情達理的日本人老闆<sup>50</sup>等等，香港小說中對日本人的正面形象處處可見。

45 嚴力，「紅燒鯉魚」，《『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六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27至28。

46 嚴力，「紅燒鯉魚」，《『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六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28。

47 嚴力，「紅燒鯉魚」，《『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六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28。

48 也斯，「幸福的蕎麥麪」，《『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五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94。

49 日本學者漢學家小澤老師則是做學問嚴謹的老教授：「我遇見漢學家小澤老師，在一漢學會議裏。和小澤老師很談來，他漢語造詣很深，人很親切……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小澤老師原來文革時在山東。物質條件簡陋不是問題。捱苦不是問題。那時有的是理想……我抬頭，看見圓圓的菩薩般的小澤的慈悲的臉上，流下了一滴淚。」也斯，「幸福的蕎麥麪」，《『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五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88至189。

50 龍昇在『博士碩士不是』中則提及日本人老闆是知情達理的：「日本經濟不景氣，為降低成本，老闆把眼光轉向中國。看到對體力勞動很認真的金輝會了些日語，便提拔他進了辦公室，雖仍然是臨時工，卻算白領階級了。在辦公室熟悉了一個

至於負面人物方面，關麗珊『異域』就寫了日本出現新世代隱士：“生活實在頹廢，日本將這類不工作不讀書的青年歸類為‘新世代隱士’，由家人養活，可以一個月不踏出家門，甚至房門一步，就這樣躲在家中，由青年活至中年，十多二十年完全空白，這類人口以百萬計，很快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sup>51</sup>崑南『死寂的南根』中也描寫了日本書店老闆的不友善形象：“當書堆積在一起時，就只有垃圾的印象。當我第三次遊東京的神田神保町舊區時，已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興趣……當我發覺手不夠長，無法拿下看到的一本書或僅僅拿到了，突然聽到店主的吆喝聲，手一縮，書便跌了下來。”<sup>52</sup>也許是新世代的作家都身處互聯網通訊年代，對日本人的觀察和理解也比較深刻，這些作家例如關麗珊等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還是比較正面的，所描述的是多樣化的人物形象，貼近現實生活，甚少挑起讀者反日的情緒。

## 7. 結語

本論文就香港近五十年小說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描寫進行討論。研究發現小說作品中日本人角色形象並非全部從五、六十年代負面的描寫慢慢轉變成現在的正面描寫。五、六十年代香港小說作品中的日本人雖有奸角，但主要都是日本的軍人，他們因應歷史的需要而出現，反映日軍侵華的暴行。不過，除日軍的角色外，其餘日本人都是正面的人物，他們愛和平，反對日本用戰爭解決問題，而且更

---

月，業務懂了些，黑瘦的臉泛出些白淨，老闆決定派他到中國去找貨源……返回日本第二天，他就興沖沖告訴我，他們老闆考慮將他轉正聘請的事了。」龍昇，『博士碩士不是』，『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六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284。

51 關麗珊，『異域』，『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二輯第六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頁52。

52 崑南，『死寂的南根』，『香港文學選集系列』第三輯第十三冊，陶然主編，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2年7月，頁29-30。

和中國人成好朋友，互相幫助。到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後，就算故事出現日本軍人角色，他們已不再擁有大奸大惡的性格，而是爲自己和日本的惡行感到羞愧；另一些日本角色則是較貼近現實的人物，他們跟隨故事情節的發展，是否日本人的身份對讀者來說已不再重要。

因此，我們認爲：大部份香港的小說創作者沒有因日本侵華戰爭和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保釣運動而製造一個負面的日本形象，推動反日的情緒；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香港社會相對比較開放，外來文化的輸入，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人們容易接納不同的思想文化，加上時間的流逝，年輕一代對日本當年的侵略暴行認識不足，並且日本文化廣受青年人歡迎，產生很大的影響力，例如樂消閒方式、音樂、電視劇集、資訊科技等，這方面的社會改變，可能也從小說作品中反映出來，譬如當代作家對日本角色的描述會比較中立的，甚至是正面的。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Japanese Images in Modern Hong Kong Novels**

Hok Chung Ng(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unsang Cho(Pai Chai University)

Regardless of the era, literary works more or less reflect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ideology at that tim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s not too long, but it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literary models, evolving with the changes of different times.

This thesis explores whether the image of Japanese in Hong Kong novels has been negatively evaluated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resistance. The article mainly starts with two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magazines,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collects,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ovels and stories of Japanese characters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article uses novel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Japanese images in novels in recent decades. Most of Hong Kong's literary creators did not create a negative Japanese image despite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the Diaoyu Movement in the 1970s and 1990s to promote readers'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1950s to modern times, the chang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Japanese characters in literary works are not

obvious in Hong Kong, and none of them give readers a negative image of Japanese.

**Key words:** Hong Kong, novels, Japanese, images, *Chinese Student Weekly*, *Hong Kong Literature*

## [參考文獻]

□ 單行本

甘豐,「亡魂」,『香港文學』第132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5年12月1日。

古遠清,「七十年代前半期的『中學生周報』」,『香港文學』第145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7年1月1日。

郭晉秀,「小鬍子」,『中國學生周報』第162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5年8月26日。

陶然主編,『香港文學選集系列』,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2年。

劉同績,「手」,『香港文學』第15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6年3月5日。

方禮年,「萬年靈芝」,『香港文學』第197期,香港文學雜誌社,2001年5月。

白楊,『台港文學:文化生態與寫作範式考察』,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

徐速,「小雲雀」,『中國學生周報』第308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8年6月17日。

徐速,「櫻子姑娘」,『中國學生周報』第304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8年5月16日。

徐速,『媛媛』,香港:當代文藝,1994年。

舒巷城,『白蘭花』,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艾思明,「鍊」,『中國學生周報』第363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9年7月3日。

吳華,『台港文學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

王劍叢,『20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出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云上人,「幽玄之美與愛八一春日若宮的紫」,『中國學生周報』第1035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72年10月6日。

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田銳生,『台港文學主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

鍾曉陽,『停車暫借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

周惠娟,「授之死」,『香港文學』第91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2年7月5日。

陳浩泉,『追情』,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2年。

馮偉才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86-198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洪道,「雲麗嬌」,『中國學生周報』第175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5年11月25日。

黃文湘,「胡椒樹」,『香港文學』第130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95年10月1日。

黃崖,「棘花」,『中國學生周報』第352期,中國學生周報編輯委員會,1959年4月17日。

黃傲雲,「守川的誤點『餐一西伯利亞列車之二』」,『香港文學』第60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9年12月5日。

黃傲雲,「安娜的最後安息—西伯利亞列車之一」,『香港文學』第51期,香港文學雜誌社,1989年3月5日。

黃維樑編,『活漠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접수일: 2021. 03. 29 총평일: 2021. 04. 27 게재확정: 2021. 04. 29